

(續77期)

十、辭典之編纂

辭典的編纂，包括文法書在內；這是語文學習的兩個支柱，缺一不可。德國的佛學研究以巴利文學開始，因而亦展開編纂巴利文法書的風氣；辭典方面，可能由於有 T. W. Rhys Davids 與 W. Stede 合編的「巴利英語辭典」(Pāli-English Dictionary) 在先，且此已是一極為完全而優秀的辭書，故德人較少在這方面

又分析了「律藏」(Vinayapitaka)，寫了「有關巴利文特別是律藏中的格法的句法之研究」(Studien zur Kasussyntax des Pāli, besonders des Vinaya-pitaka)。又在巴利經典方面，L. Alsdorf 致力於透過東方方面的版本來修正舊有的版本，和分析巴利文學偈句上的問題，其結果表現於他的「巴利藏經的雅利安偈頌」(Die Āryā-Strophen des Pāli-kanons) 中。

在梵語方面，Otto Böhtlingk 與 Rudolph Roth 合編「梵語辭典」(Sanskrit-Wörterbuch)，這是目前世界最詳盡的梵文辭



德國之佛學研究

吳汝鈞

用力，而集中於研究巴利文的文法結構一點上。至於梵文藏文辭書文法書的編纂方面，亦有可觀的成果。

在巴利文的研究方面，首先必須提及的是巴利文學大師 Wilhelm Geiger (1856-1943)，他在這一天地上作過很大的努力。他除對巴利文歷史「島史」與「大史」(見註⑧)作過多年的研究外，並編了一本最佳的巴利文法書「巴利文·文學與語言」(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此書其後有 B. Ghose 的英譯本，名爲 Pāli and Language。近年，Oskar von Hinüber (1939-) 亦

典之一，或竟是最詳盡的；它比英國的 Monier-Williams 及印度的 Apte 所分別編纂的梵語辭典還要巨大。此辭典其後又有 Richard Schmidt 的補充，題爲「梵語辭典增補」(Nachträge zum Sanskrit-Wörterbuch)。文法書方面，A. Thumb 編有「梵語手冊：有關古印度語的語言學研究的一個入門」(Handbuch des Sanskrit, Eine Einführung in das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Studium des Altindischen)②。這是相當實用而有效的文法書。Max Müller 亦有梵語文法書，以英語作成。

又在關於佛教混淆梵語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⑤③ 的研究方面，自美國的 Franklin Edgerton (1885-1963) 的「佛教混淆梵語：文法與辭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一巨著出版以來，即引起學者們討論這種梵語的熱潮。Edgerton 氏基本上是用詩體的觀點來研究梵語的。對於這種研究方法，德國學者紛紛加入討論，其中包括有 Waldschmidt, Heinz Bechert, 及 Franz Bernhard (1931-1971)。

西藏文的研究方面，當推上面提到的 H.A. Jäschke 為大家。他用英語編了一藏英辭書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又以英語寫了一本藏文文法書 Tibetan Grammar。

十一、中國佛學的研究 (禪學以外者)

這裏我們要附帶一述的，是德國學者對中國佛學的研究。這並不表示德國學者在這方面有甚麼特殊的表現，而只是由於這與我們有比較密切的關係而已。事實上，德國的中國佛學的研究，還是很貧乏，可以說還是在開始階段。除了在禪宗方面有比較可觀的成果外，似乎只有三數學者們在這方面做功夫，而且也只限於南北朝以前的佛學。隋唐以還所興起的，而能真正代表中國佛學的，例如天台與華嚴，目前還未聽聞有人問津。而德國學者之可以在南北朝以前的佛教方面做些研究，那恐怕是有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巨著在先之故，起碼這是一極其重要的參考資料；書中提供了很多有關那個時期佛學發展的文獻 ⑤④。德國的禪學研究，是德國的中國佛學研究中最重要部份；其中的內容，我們在上面第八、九兩章中已大體介紹過了，特別是以 Dumoulin 與 Gundert 兩人的貢獻尤大。關於這點，這裏不再重覆。這裏只就禪學以外的研究介紹一下。

首先要提的是 Walter Liebenthal。他獨力對「肇論」作過很廣面的研究，寫了 Chao-Lun: The Treatises of Seng-Chao 一書。其中收入肇論的四篇論文的英譯及詳盡的註釋及評論；這四篇論文是「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論」。第三篇「般若無知論」中又附有「劉遺民書問肇公答」的

譯文。另外該書又載有譯者所寫的一篇緒論，歷敘僧肇的平生、作品及其哲學思想各面。最後又附有譯者的兩篇短文，討論中國佛學的「六家」問題，及「涅槃無名論」的真偽問題。⑤⑤ Liebenthal 研究肇論，比較強調義理方面，故他的翻譯，有不少處是意譯，或較為自由的翻譯。他自己在該書第一版前言部份即已表示，由於肇論的哲學成分相當濃厚，故要理解其義理，比字面的翻譯困難得多。⑤⑥

Liebenthal 對於慧遠，也作過廣泛的研究；這主要表現於他對慧遠作品的翻譯方面。他曾譯有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部份、「明報應論」和「三報論」。他又譯有宗炳的「明佛論」和慧琳的「白黑論」。他把研究慧遠的思想，總結在其「從釋慧遠的作品看其佛學」(Shih Hui-yuan's Buddhism as Set Forth in his Writings) 一文中。他又研究過竺道生，寫有「道生及其時代」(Tao-Sheng and his Time) 一文，其中有對於中國佛教在四、五世紀時的發展的論述，有對於竺道生的世界觀念的探討，及翻譯了竺道生的一些作品，和載有竺道生的傳記。

在佛學一般方面，Liebenthal 也作過一些研究。這不必是限於中國佛學範圍中的，這裏亦聊為簡述一下。他在這方面所寫的作品，計有：「中國思想中的靈魂不朽說」(O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in Chinese Thought)、「心法」(One-mind Dharma)、「我·各面之義意」(Ngo, Variations of Meaning)、「物與法」(Ding und Dharma)，在作為其反對者的佛教中所顯示的因中有果說」(Sattārya in der Darstellung seiner buddhistischen Gegner) ⑤⑦、「中國思想的一些趨勢」(On Trends in Chinese Thought, 等等。

另外一個值得留意的學者是瑞士籍的 Erik Zürcher。他用浩繁的篇幅，詳盡地寫了一本題為「佛教之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一書。這書附有詳細的註釋，書目及索引。筆者以為，這是一本十分值得一讀的書，它透過社會現象的角度，描述四世紀及五世紀的初期佛教在中國中部及南部的發展情況。這書的特點是注重分析作為一種外來宗教的佛教在這個

時期在中國發展，中國人對於這一外來教義所作的反應，及分析當時中國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的環境。作者之持社會現象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其用意可見於該書第一章緒論有關「中國佛教」一節中。這裏不妨節譯一小部份來看看：

「首先必需指出的是，早期的中國佛教是一具有獨特性的體系，是一種獨立發展的結果，這只能透過關連到當時的文化環境一點來研究和了解；這種發展是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下進行的，它與當時流行的中國的世界觀的背景相對反。因此我們要對那些多方面的文化的與社會的因素予以適當注意；這些因素使佛教能在中古早期的中國社會形成，和刺激它發展。我們必需先做到這點，才能充份討論教條的純粹義理方面的問題。

「……………」

「作者之要強調社會背景一面，固然一方面由於他以為，所有宗教運動——不管它是如何地與世隔絕——都不能純粹地和單純地作為「觀念的歷史」而被研究。一方面這亦是佛教自身的性格的邏輯的結果。佛教不是一「理論」，對宇宙的一種解釋；它也從未以此自任，它却是一種能脫解的方式，一種生活的方式。它的傳入中國，不止表示某些宗教規條的繁殖，且亦表示在社會組織方面一種新形式的傳入：這即是僧伽的寺院的社團。對於中國人來說，佛教始終是一種僧人的教義。佛教寺院在中國的存在所喚起的力量與反力量、知識份子集團和政府的态度、僧侶集團的社會背景 and 地位，以及寺院社團的逐漸融合入中古的中國社會中，這些都是對早期中國佛教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的根本的社會現象。⁶⁸ 作者的這種基本觀點，即決定他以社會學的方法論來研究這個極其複雜而有興趣的問題。

因此，資料的運用，便變得十分重要；特別是四五世紀這個在文化上青黃不接的時期。作者將其運用的資料，分為兩種，這都是關乎佛教的：其一是歷史傳記，其一是早期辯護和宣揚佛教的文學。前者是基本的，它包括慧皎的「高僧傳」、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寶唱的「比丘尼傳」、和寶唱的「名僧傳」；後者的文學與哲學價值較弱，但對佛教在中古時期對中國思想與社會

的衝擊，提供重要的資料，其中包括「牟子理惑論」、「正誣論」、「宗炳的「明佛論」、孫綽的「喻道論」、何承天與宗炳論慧琳「黑白論」的來往五函件、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羅含的「更生論」、慧遠的「沙門袒服論」、慧遠的「明報應論」、慧遠的「三報論」、桓玄與王謎的「論道人應敬王專」的來往八函件、慧遠的「論料簡沙門書」、「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郗超的「奉法要」、和戴逵、慧遠、周續之論戴逵的「釋疑論」的來往八函件。

就社會學的方法論來研究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特別是漢末至隋唐⁶⁹間那段社會成混亂狀態時期的發展，無疑能使視野擴闊，能注意及社會廣面的因素；這亦是我們一向強調的重義理的方法所不及處。就佛學研究而言，這總是一種很可參照的方法。

(未完待續)

附註：

⁶² 梵語屬於印歐語族中的印度伊朗語族，在比較文法學中稱為古印度雅利安語(Ancient Indo-aryan)，這在德文稱為古印度語(Altindisch)。

⁶³ 佛教混淆梵語，是大部份佛教經典的用語。它是梵語的一種，以古代中印度某一種口常語為基礎，多方借用另一中印度的方言而成。美國的Franklin Edgerton，即是這種語文的權威學者。

⁶⁴ Walter Liebenthal在其翻譯「肇論」一書第一版的前言中，便直認西方(特別是以德國為然)的中國佛學的研究，還是在幼稚期。他說這話時大抵是本世紀三四十年代。這句話似乎到目前還可以再說一遍。

⁶⁵ 「涅槃無名論」一文，後人懷疑非僧肇作，湯用彤即持此見解。Liebenthal則取保留看法，以之為真作，但經後人竄改。

⁶⁶ 關於「肇論」的研究，要以二十多年前日本學者塚本善隆及其所領導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學者所作的研究，最為詳論，而且忠實原著。其研究成果，具載於「肇論研究」一書中。

⁶⁷ 因中有果說(Sathārya-vāda)以為，作為結果而顯現出來的現象界，必內在於因中，因與果性質相等。數論哲學即有此種主張。

⁶⁸ E.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ext, Reprint, with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Leiden, 1972, P. 1.